

李佩甫小说叙事传统与对话

苟乐乐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 探讨了当代作家李佩甫与鲁迅文学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差异。文章认为, 李佩甫可被视为鲁迅文学家族的“远亲”, 其创作在整体精神气质上与鲁迅开创的批判传统存在一种“家族性相似”, 尤其在悲剧审美与国民性批判主题上承接了鲁迅的精神衣钵。研究以李佩甫的《送你一朵苦楝花》与鲁迅的《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祝福》等小说为核心分析对象, 聚焦于“吃人”意象的象征系统、看客现象与国民性批判, 以及权力文化对人性的异化等核心命题。文章指出, 两位作家都深刻揭示了传统与社会权力结构如何“吃人”——即摧残个体精神与自由, 并均以悲剧眼光审视人的生存困境。然而, 李佩甫的批判在同情民间苦难的基础上展开, 更侧重于挖掘乡土民间生存逻辑与权力体制共生的复杂性, 实现了对鲁迅“批判国民性”主题的当代转型与在地化结合。本文的分析还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需要与类本质异化的观点, 以深化对作品中权力关系与人性困境的理论阐释。

关键词: 国民性批判; 吃人意象; 看客现象; 权力异化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and Dialogue in Li Peifu's Novels

Gou Lel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Gansu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iterary spirit of contemporary writer Li Peifu and that of Lu Xun through textual close reading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Li Peifu can be considered a "remote relative" of the Lu Xun literary family, with his works exhibiting a "familial resemblance" in terms of overall spirit and temperament to the critical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Lu Xun. Specifically, Li Peifu's creation continues Lu Xun's legacy in the areas of tragic aesthetics and critiques of national character,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the symbolic system of the "devouring" imagery, the phenomenon of spectatorship and critique of national character, as well as the dehumanization of power culture. The study focuses on Li Peifu's novel "A Lotus of Bittersweet Flowers" and Lu Xun's novels such as "A Madman's Diary,"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nd "Blessings," examining core themes such as the "devouring" imagery, spectatorship, critique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ity caused by power structures. The analysis incorporates Marxist views on human nature, needs, and the alienation of species-specific qualities, thereby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power relations and human dilemmas in the works.

Keywords: Critique of national character; Image of the eater; Phenomenon of spectators; Alienation of power

1 与鲁迅文学精神的内在联系

“如果着眼于新文学传统, 在整体文学气质上, 李佩甫与鲁迅文学的精神联系并非最为紧密。个人认为, 在当代作家之中, 莫言、张承志、余华、苏童、毕飞宇等人和鲁迅文学的精神关联更为密切, 甚至可以将他们看作鲁迅文学家族的当代成员, 乃至鲁迅文学精神的当代变异和调整, 而李佩甫则可以算作鲁迅文学家族的远亲, 既有一定的关联, 又很难把这种关联进一步扩大和提升到一种更为相近的文学精神上来。这种文学精神在李佩甫的中篇小说

《送你一朵苦楝花》与鲁迅《狂人日记》在精神气质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两者是‘家族性相似’。两部作品都涉及人的存在的悲剧性质, 都显示出以悲剧眼光看世界的悲剧审美精神。”另外, 李佩甫对鲁迅叙事传统的继承还相应的体现在他对“批评国民性”主题的当代转型上。

小说《送你一朵苦楝花》和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两者在叙述鲁迅文学精神气质“家族性相似”上表现出了较大的联系与区别。“两部作品一个非常突出的契合点, 就是都以‘吃人’象征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人的摧

残、戕害，都是以悲剧的形式叙述人性自由、个性解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母题。”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吃人”现象的叙事如下：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

文中“也”一字，凸显他们曾经也是受制于权力牢笼苦难下的普通民众，因受权力的限制，沦为权力的“牺牲品”。而当他们熬过权力的压制，成为所谓的“吃人”族后，将曾经所遭遇的痛苦与折磨再次通过“吃”的方式开始压制新一轮的“被吃者”，以此发泄内心对社会黑暗的不满之情。于是，那时的社会权力文化再现在“被吃者”面前，循环往复，深深地将权力文化内化于心，成为满足个体利己性的工具。就利己性而言，马克思主义者从未否定人类利己性的本性，因为他是人之本性。另外，有学者指出“保证实现个人私利是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需要和私人利益是成为连接人与社会的唯一纽带。恩格斯曾明确认为：“需要就是人本性”，“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小说《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族”曾经也是受难群体，正如路遥曾因苦难而受制于人一般，心中对权力的需要达到顶峰，从此角度而言，这确实是人性的体现。当需要的人性本性向众人示出并得到满足后，便开始实施策略满足自己的私人利益，如“吃人族”从需要权力到得到权力后，肆意妄为地使用权力来消解曾经的折磨，满足自己的“私人利益”需求。

2 李佩甫作品中的“看客”

当然，除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外，“吃人族”与“被吃者”的关系在李佩甫小说《送你一朵苦楝花》中亦有显现：

“小弟觉得，他一下子被目光包围了。村里的目光，街上的目光，亲戚们的目光，还有哥哥嫂嫂的目光……所有的目光都含着同一个意思：他有病。他们用目光抚摸他，用目光切割他，用目光告诉他：你有病。”“他仿佛听到了‘窸窣窣’的声音，他感到他正被一种无形的东西一口一口地吃掉。亲情、乡情正化成一张巨大的嘴，要把他嚼碎吞掉。他想喊：我不吃人，人也别吃我。可没人听得懂，人们都笑着，很宽容地笑着。他一下子成了‘人民’的敌人。

他周围晃动着许多脸，陌生的和熟悉的，这些脸上都带着同样的关切，同样的‘我们’的庄严，同样的‘为了你好’的真诚。他孤立了。”

文中“一下子”和“目光”两词，从侧面表现小弟在众人视野中的局促与无力之感。来自“他者”视角的眼神间接传递出小弟是个有病之人的信息，再借用眼神“吃掉”小弟的精神士气，使他在这个社会无法生存。倘若认为情感的力量可以使一个人精神焕发，那此时“情感”符号的意义就得到具象化的展现，然而情感的力量受社会客观因素的制约，情感上的关爱已异化为“吃人族”吃人的工具，成为一种软弱的对抗力量。那造成这一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究竟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最主要的是社会群体与个人群体的对立，人以社会方式存在，个体又存在于社会，社会却以各种方式压制人善良的本性，导致人们的眼中仅剩权力和利益。当人们自己能够驾驭权力时，过往不堪的遭遇貌似得到应有的宣泄，就似如小弟一样，乡亲们看见小弟就好像看见曾经被权力压抑的自己，导致乡亲们宣泄行为不分青红皂白，以病态化的方式存在于社会间。马克思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吃人族”与“被吃者”的符号文化系统已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的权力文化话语，但相较于当下现实情况而言，那时的符号文化系统依然滞留在现下，如我国多数普通人民依然受制于权力系统的打压，使人民的内心得到扭曲，对权力的需要再次再现在世人眼前。然而，对比鲁迅笔下的“吃人族”，当今社会的“吃人族”因受现实客观因素的制约少几分暴虐与肆意妄为的意图，增添几分人性的温暖。吃人族与被吃者二者之间的关系，欲想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其根源在于人类本性的改善，因为人类本性意识的改变与整个历史呈正比关系。

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吃人族”与“被吃者”关系揭示人类本性、社会历史、权力话语三者之间的关系，此三者关系也同样在李佩甫小说《送你一朵苦楝花》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只是李佩甫在阐述三者关系的同时，他还指出“吃人”悲剧的审美性表现在同情民间苦难方面，而民间苦难的前提是建立在批判国民性主题。批判国民主题隐含的逻辑就是在同情民间苦难前提下，把民间社会文化当作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认为乡土的民间生存状况，其实也包含了对他们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权力话语体系。当然，简言之，它实际上可以简单看成一个人格缺陷的民众，另外层次来看，更是建立在民众人格缺陷上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可谓是在当代表现这方面主题的佼佼者。

他的乡土小说描写范围几乎从来都不超过古称‘许’，今称河南豫中平原这一块地方，但从内在精神上来看，他是鲁迅新文学‘批判国民性’衣钵的当代传承者，自始至终从未失去带有现代理性的批判精神，还执着地把对国民性精神的挖掘与乡土民间的文化进行紧密的结合起来，从而营造出一种既有现代精神的阳光，也有民间生存审美意蕴的精神符号。

然而，对于“国民性批判是学界认定鲁迅启蒙的把柄。在这个问题上，阿Q，以及围观阿Q、夏瑜杀头时候的看客，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国民劣根性。对于它的讨论，不同学者也给予相应的阐释，易竹贤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是欺瞒和欺骗式做戏和看客般的无聊；缪军容认为“对国民性的批评是鲁迅先生毕生最重要的贡献，其中，‘精神胜利法’随着‘阿Q’形象而家喻户晓”正如李欧梵所言，“‘可以说在《呐喊》诸篇中鲁迅是在揭示他的中国同胞的集体的精神病，亦即国民性，这种探索在《阿Q正传》中得到了某种失望的结论’”（引用问题一上标）

看客现象在小说《阿Q正传》中篇幅占比较多，当然，它也是国民病态现象的重要象征。看客，在鲁迅心理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痛点，更是他弃医从文的重要原因。对这种麻木不仁的特征在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得到具体的表现：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的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蚂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现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阿Q认为自己因少唱几句戏而无颜面对吴妈，吴妈的出现，给予阿Q在面对法场酷刑时精神上的安慰，使阿Q的心理得到一丝慰藉，心想还是有人关心于自己，自己不是一个人，还有亲人的爱与陪伴。反之，定是“嚓”的要赶去杀头，阿Q在人群中左顾右盼的看向路上的人们，个个眼睛中充满兴奋与好奇，全似蚂蚁般的人，成为一群看客，轰轰烈烈地在讨论，诉说着对这场酷刑的猜测，但丝毫未有半分对自己的怜悯之情。阿Q面对吴妈给予自己精神上的快乐和胜利与看客们激烈地讨论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是来自亲人般的关爱，另一方面是来自看客们的冷嘲热讽，使阿Q的心理增添几分难以言表的味道。而看客

们的麻木不仁在小说《祝福》中亦有同样的体现，其一是乡亲妇女们面对祥林嫂的诉说流下眼泪。祥林嫂向众人诉说儿子阿毛在门槛上剥豆后消失，经寻，在山坳里看见阿毛的小鞋，尸体在草窠里，肚子里的五脏六腑似乎已被狼吃空。听着祥林嫂所遭遇的苦难，周围的女人们改变原有的鄙视态度流下些许眼泪，但此眼泪并非是对祥林嫂的遭遇感到同情，而是表现出凑热闹和听八卦之感。其二是乡亲们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苦难上。部分女人若未及时听见祥林嫂的苦难，便从十里外的大街上纷纷赶来，必须在当场亲自听祥林嫂的苦难遭遇，之后落下看似真心又不真心的眼泪，对祥林嫂失去儿子痛苦的事情开始评头论足，以此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和言语需求。此时，祥林嫂失去儿子痛苦的遭遇在乡亲人的心理已被异化为情感需求得到满足的“粮食”，当自己的胃口已到达饱和时，乡亲们已丢掉虚伪的掩饰，便是讲究以慈悲为怀的老太太们已然也丢弃伪饰的面孔，庐山的真面目露在祥林嫂的眼前，对她的遭遇表现出厌烦之感。

3 结语

以上便是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麻木与冷漠，无论是阿Q去法场路上，路人们表现出看热闹听八卦之感还是祥林嫂诉说苦难时，乡亲们所扮演的伪装面孔，都表现出人们当时的快乐和洋洋得意之感。当人们痛苦的遭遇变为维持自己生存情感的工具时，人与自身的类本质产生根本性的异化。那究竟何为类本质？学者指出“在科学思想领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大的成果。费尔巴哈以庸俗唯物主义的形式，将人和自然两大要素纳入对人的理解中，由此形成‘类本质’学说。”而马克思也曾给予明确的阐释“人是类存在物，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类本质。”

参考文献：

- [1] 李勇.《田园将芜胡不归？——论城乡之间的李佩甫》《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 [2] 刘军.《<生命册>：“爱欲与文明”的纠割与疏离》《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4期.
- [3] 李丹梦.《李佩甫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 [4] 刘新锁，刘英利.《道德立场的坚守与困境——对李佩甫小说的一种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 [5] 李春.《从李佩甫小说看河南作家关于“乡土”的三种状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6] 李超.《从以乡观城到城乡互看——李佩甫小说中的城乡关系书写》,《中国文学批评》,2022 年第 3 期.

[7] 刘宏志,李佩甫.《李佩甫小说研究》《河南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8] 刘幸,黄涛.《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的历史文化意蕴》《中州学刊》,2021 年第 9 期.